

仪式

崇拜与有序的神圣

系列主编◎郝苏民
系列副主编◎哈德江

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田野报告系列（第七集）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丛书总主编◎祁庆富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系列(第七集)

丛书总主编/祁庆富

系列主编/郝苏民

系列副主编/哈德江

仪式:崇拜与有序的神圣

钟建华 王项飞等/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仪式:崇拜与有序的神圣/钟建华,王项飞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8

(人类学·民族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系列丛书)

ISBN 978-7-81108-585-3

I. 仪… II. ①钟…②王… III. 信仰—民间文化—研究—报告—中国 IV. 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4759 号

仪式:崇拜与有序的神圣

作 者 钟建华 王项飞

责任编辑 覃录辉

策划编辑 沙 平

装帧设计 张日河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河北省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9.625

字 数 240 千字

印 数 1500 册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585-3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人类学·民俗学及其田野

——我们从这条路上这样走来*

郝苏民

1984年，原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终于创办了自诞生30多年以来首个院级研究所，即西北民族研究所（此前在“十年动乱”后，方有一个民族教育研究所〔筹〕）。曾是参与当事人的我们，其动机原本出自对“十年动乱”反思后的一个学科基本建设之举。研究所名还是当时国家民委领导人拟定的。这个反思的根据就我们那时的主旨，是出自这样一种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建立肇端，代表中国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府，一反千年封建王朝和1949年已全线崩溃的国民政府大民族主义的统治惯制，要在全中国范围实现各民族当家做主、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于是开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工作，少数民族干部和懂民族语言与能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干部的迫切急需，成为一切工作的首要。为此，应运而生了民族高校的创办。共和国第一所民族高校，便是西北民族学院。应该说，民院类型高校群的产生，确系中国教育史中最崭新而光辉的一页。然而令人难解的是，从成立伊始的1950年，直至1984年前，本身就体现着新中国全新民族观与政策的第一民族性高等学府——西北民族学院，虽也有过一个运行时间很短的“研究室”，却未曾有过科学意义上成体系的民族学的理论研究、专业建制与教学队伍的组建！新中国初期，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相关专业经过“院系调整”后迁到西北民院的蒙古、藏、维吾尔语文教学，整合为“语文系”，完全成为解决民族语文翻译急需的性质，而非民族学专业。虽然学科建设上的这种“畸形”，责任与损失并不都来自学

· 2 · 崇拜与有序的神圣

院本身与办学者个人，它与当时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之类学科在中国的遭遇完全是一致的。但是随着“十年动乱”、“四人帮”的垮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的确对有志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学人和教育者们既是一个极大鼓舞，也确实促使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一个认真反思：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所谓“红色政权”及其造反派们一举“砸碎”、撤销这所新中国首所少数民族高等学府时，其一切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肆意妄为，竟是那样地顺利得逞！曾参与创办这所学校的师生们为什么竟是毫无理性抗争，亦无正义反对？……所以说，1984年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的创办，应该视为当时本院民族学人、教育工作者与当时国家民委领导人痛定思痛的一个学术心愿和忠诚民族教育的初步圆梦！

然而，发展的道路又总是曲折的。意外的是一个向“市场经济”转型，却能带来所谓“全民下海”（单位创收）的冲击，一时大学捷足先登者从办班中捞上第一桶金后，便产生了连锁效应，吸引不少当时本在坚守岗位的教师们为之心动。希冀重建人类学的敢想者中也出现了教学与科研比重的意见分歧，科研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经费短缺问题无从提上日程的迷茫，而此直接涉及到教师们工作量、课时、职称等切身利益的不平与困惑。自然，复杂的表层不能掩盖其简单的内因：历史关头老校如何“新生”，学校未来整体发展如何构架？民族性老校的传统究竟是什么？时代使命的角色该怎样定位，哪些是理性实证了的真正“拳头”专业？一应恢复、重建哪些机构？又该急速补缺扩建哪些必有的学科？……实话实说，这些本为教育、办学内行领导的例事，那时我们却还在该不该调进某人、该谁来办某事等人事关系上纠缠不前。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理念，在那时还无法“理直气壮”地进入所有负责人的指挥头脑。自然这里的专业人员一时被这些“不大不小的问题”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十年动乱”已耗费多少年华，而之后，难道还要空待大好时机这般

流失？事到此时，方知为这等“文化大革命”须付历史代价之了得；方知真正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知识的缺失于民族高校的创办、经营关系的重要性何等至关！然而，必须有思想准备：“文化大革命”之患今后仍须渐次从各方——在高校显出……

事情原本还有另一面，其时，一是全国先行者高校教学改革如火如荼；二是部分研究者受全国学界大好形势感染不甘心无所作为去坐地搞“创收”。经过彷徨、内外沟通、酝酿，再经过“年年五月换领导”的“阵痛”，终于在1998年10月，借教育连续改革热潮启动和校方一些领导认同，以放弃原基础资料设备和经过几次整合的队伍、研究所名称、建制和大部分成员为代价，仅从其中三五青年学术同道加个别老先生，走出了原本满怀希望的西北民研所的大门，重新组合了“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系）合一的机构。这个人类学、民俗学名称的出现，为这个“共和国首座民族高校”办学近半个世纪后首次整合、填补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专业从未有过的科研与教学空白；也在民院首出“系所合一”的教学形式，把科研直接引入课堂教学。在大西北人文社科学界第一次出现了“人类学”的学科建制。2001年7月26—8月4日，在费孝通教授力荐下，借教育部为北大批办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契机，在西北重镇兰州与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及西北民大合作举办了全国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研班。

费孝通先生煞费苦心，目的有二：一为扶持西北民大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的开创；二为开发西北培养西北各民族此类专业的研究人才。费老亲临民大为我系揭牌，并在开幕式和研讨会作《民族生存与发展》、《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的主题讲演和讨论中的“插话”；还召开来自大西北各地青年的专题座谈会，谈到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培养少数民族出身专业人才的重要和迫切意义。他语重心长、深入浅出，这给有志学科建设者们以极大精神支持和学术“扶贫”。

· 4 · 崇拜与有序的神圣

1990年我们曾首获民间文艺学（含民俗学）硕士学位授予权（钟敬文、马学良、宋蜀华等老一辈学者惟图学术的胸怀和勇气，成了真正“助人成功”的关键），1991年即开始招收民俗学研究生的教学。鉴于我们对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民间文化（含民俗文化）的历史脉络和多元现状及其特征的本土理解，在组织教学与科研上，确定了重视田野作业，开辟民俗志积累，坚持多民族地域多元文化特色，从头打好学术基础建设的发展思路。再加上人类学、民族学教学点的逐步开拓，社会学教学的开办，我们打通了三门学科的交叉，为以往全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传统教学仅设在中文系（汉语系）多作为选修课的惯例，以每位研究生的旨趣和优长（或民族、或地域）为本，定其专业研究的具体方向。随着实践的延续果然局面顿开。至2007年，这个教学点共招生了13个民族的134名学生，已毕业者近三分之二以上成为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考博生源，他们分散于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中山、复旦、南开、中央民大、华东师大、东南大学等多所名牌大学攻读、“进站”。这一集中现象是西北民大创办以来其他院系、专业所未曾有过的！更重要的是，在培养人、训练队伍的同时，积累了不少以专业要求采集到的比较有质量的田野民俗志的新资料。尤其近年来，费孝通教授提出，西部大开发中人文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开发的问题后，我们参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承担了文化部、科技部“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民俗部分的任务中，更坚持了研究生们在导师指导下发挥地方性知识和少数民族语言无障碍的优长，深入生活第一线，零距离现场考察的专业训练的学风。民俗学研究生教学实践，在历练了教学骨干的同时，区域民俗志资料的成果，累累结枝。我们积累了几百万字的民俗志数据库资料。

我们这个系（所）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艰苦奋斗，借助全国形势好转带来的时运，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人类学·

民俗学学院”。我们把民俗学的整体学科建设、发展路子，摆脱开往昔传统上仅从“文学”上先入为主，唯以“民间文学”带动民俗学的旧教学轨道，借鉴相近学科人类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优势，既互相交叉渗透、互促发展，又各自保持相对学科独立地发展轨迹。我们用超强的劳作先后开办出游牧、农耕、人口较少民族等民俗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类型；民族、宗教、文化、家庭、妇女、影视、民间艺术（美术、工艺、歌谣、戏曲、舞蹈）等专业方向，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学生学养的丰厚、“一国多民族”的整体性大视野提供空间，以适应转型期人才市场的多样需求。目前，我们除已有的民俗学研究生点外，人类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等的硕、博生的教学都在有序地进行和不断改进完善之中。

这五年来，我们有北大、北师大、中央民大等高校相关先进专业和其中名师们的协助和具体帮助（如北大的马戎、王铭铭、邱泽奇，中央民大的杨圣敏、祁庆富，香港中大的陈志明，人大的郑杭生，辽大的乌丙安，南大的刘迎胜，北师大刘铁梁、董晓萍、万建中……），在大开局面中曲折前进。我们的民俗田野，涉及到西北各民族地区外，也借主题的需求而波及到除大西北外的内蒙古、四川、湖北、福建、安徽、山西、山东，甚至东北、西南各地。

同时，在物质条件极其不足的状态下，我们坚持依靠业内同行经办好我们的专业学刊《西北民族研究》，获得学界广泛认同，成为CSSCI刊物，也成为这三个学科硕博生和专业教师们喜爱的“敬重名流爱新秀”，“学术面前皆平等”的一块公正平台。我刊帮助各高校不少素不相识的本专业硕、博士生成全他们学位论文的问世；我们也帮助不少高校本专业多无个人关系的教师为晋职而难以发表的论文及时刊出，为专业队伍的形成，尽了我們一份责任。

又一个十年教学实践使我们感悟到：虽无理由更改已显成果

的途径，但此路子离幸得历届某些领导认同的事实，会常有不断的苦恼和艰辛！好在各高校圈内同行认可的这个探索，仍可视为一种有益的中国地方性学术经验。事实上，在我们之后，也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界大师级老一辈代表人物费孝通、钟敬文等谢世之后，我们看到：从一度誉为中国民俗学人才摇篮的北京师范大学到边陲内蒙古师范大学，也都先后改制或创办了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模式的教学建构……事实使我们欣然！

不久前，高校在一阵扩招、扩办、并校、升级之后，据说出于“冷思考”地调整把高校分类为“研究型”、“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几种发展类型，又似乎学校一旦被划进某种类型后，即将在某类型框子内以行政“规范”去“游戏”管理。历来各校内各学科、专业之间大约已有的发展水平不尽均衡、相同，是将随所属学校类型“一刀切”而对学科去、存、“凝练”？还是以所属行业学科实际水平去“强强联合”（如同当年之“院系调整”）去整合？还是随其各校自主“挖墙”、“流动”、“自生自灭”，以示“市场经济”在教育上的反映？抑或已有资源自主存留等市场经济范式？……在如今高校领导皆为专业内行，大都系博士、教授，然而并非全是教育内行的现状下，自主趋势如何发展大学，大约仅为普通身份的专业教授在学科建设、发展中发挥不了多大决定性的作用？故，大抓学科建设、学科凝练之云的真正落实，看来确实在于是否哪级所属，在不在某种“工程”之内大有关系；各高校的个性、特性或优势发展，合力如何形成？是高校的主人们来认同、推动，抑或是高校领导集团或一把手来运动高校群众？一时还看不清楚。至于教授今后走向，也和本人现属哪块“风水宝地”关联在一起！虽说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对象全关乎到群体、社会、人类、文化的大范围，但此类学术属性，往往不像办体育、办艺术那样红火而幸运；确实是一种不大显露政绩的“孤独性”学问！有可能抓学科建设的专

业内行领导人，对它了解或是否感兴趣会成为它发展顺利与否的关键吧……

当然，杞人忧天也大可不必。“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真理名言，还是无可置疑的。

好在，我们曾经的努力基于事实亦曾经地被其时本界所认同过；“有无必要”之说，本为各自所指各有个人的理解、界定和认可。无论如何师生风餐露宿的“田野”是为学执著的“书呆子们”汗水的播种。于是，仅仅出于其时一个教师的我们，本着曾经为师之心、师生同窗切磋、或曰“教学相长”之情，将把部分学子为攻读学位而参与的调查报告，做初步学术规范和可读性的整理后，以一种资源回报给社会群体；也为这世变万机的新世纪之际，师生们从前沿生活大潮中舀出的这一瓢瓢底层的生活浪花，存留给来者而感到努力过的欣慰！我们自认为这一行动对学术浮躁尚不能一个早晨就烟消云散的今天，于师、于生、于己、于众、更于学校之心，当年大师之良苦用心，皆同心同此理吧！

若幸甚而存继续从业之机，我们随时准备用被边缘化了的文化行为寻求可认同的学术合作伙伴。

我们的“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系列的编辑，虽也曾得到本学界不少贤达鼓励、促成，但终因未能直接挤入“本土”的“工程”类和“扶持”类，不足的经费导致了无法“满书尽披黄金甲”的华贵包装及名人作序牵衔、领导们的结合而春风满面，只能是“素面朝天”，以真人真事的朴实面孔迎接她的识者——社会广大民众和莘莘学子了。

本系列之一，曾为配合中国艺术研究院“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重大项目中民俗部分的采集，归入另一丛书出版；本系列之二、之三、之四共三集经本学院文化（苏依拉）博士努力得到本校资助在兰州大学出版社统一出版，由青年教师马忠才、满珂等博士热情协助，出版社责编先生们的慧眼、支持、

辛苦都是感动于心的。

现在为系列之五、之六、之七、之八共四集由中央民族大学祁庆富教授纳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丛书出版。到此，这一系列八本书，是分别由三处支持才问世的。但是从西北民族大学初创社会人类学·民俗学专业到培养出自己的硕、博生和他们的成果，我们实在是得到了不少贤达和学界君子们在关键时刻的真诚爱护、支持和帮助才有些许做为的。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又逢“国学”重新被大大提倡，教育新时代青年一代也要知恩图报，不可满城尽当“白眼狼”之际，我作为这个系列各集成果出版的操办和见证人，深深体味了出版学术书籍的不易，不能不郑重提出下列先生和同学，因他们的理解、呵护、支持、辛劳，作为其时导师今同主编的我，以及各集的撰稿人在此一一向他们致以中华民族传统式的抱拳和鞠躬：真诚地谢谢你们诸位了！

除已经鸣谢者之外，他们还应是：费孝通、马学良、宋蜀华、毛公宁、马麒麟、谢玉杰、金雅声、杨圣敏、马戎、王铭铭、祁庆富、覃录辉、沙平、马国柱、僧格、文化等诸位先生；此外，满珂、马忠才、王淑婕、那贞婷、曹玉杰、刘秋芝、王淑英、佟格勒格等硕、博士同学们。

于金城沙痕书屋 寓所 2005 年 12 月岁末
2007 年元月修订

* 注：此篇是作者为《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系列》丛书所写的序言

目 录

系列总序	郝苏民(1)
农业村落信仰民俗的文化结构和现代适应研究	
——以甘肃泾川西王母信仰为个案	王项飞(1)
民间视野中的伏羲与女娲	
——以天水伏羲、女娲信仰为例	余良才(67)
晋南万荣县后土祠俗民后土信仰调查研究	加俊(125)
青岛地区妈祖信仰与港口发展的互动	
——兼论妈祖神性职能的变迁	李海强(195)
关于闽南安溪县八社联盟关帝信仰习俗的调研	钟建华(246)

农业村落信仰民俗的文化结构和现代适应研究

——以甘肃泾川西王母信仰为个案

王项飞

一、引言

美国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曾经说过：“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研究农民，对农民缺乏了解是造成很多发展规划失败的原因。”本篇论文致力于研究农业村落信仰民俗的文化结构及其现代适应，通过对甘肃泾川西王母信仰民俗的文化结构和变化脉络的梳理，探讨社会转型对农业村落信仰民俗的影响以及农业村落信仰民俗在社会发展中所做的自我调适，为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提供理性思考。

1. 问题的提出

西王母信仰是中国传承久远扩布广泛的民俗事象。早在《山海经》、《庄子》、《穆天子传》等古籍中就对“西王母”有较多记载，而《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等魏晋小说的铺张描写，使西王母的形象更加丰满。汉代，西王母进入道教神系，西王母信仰开始普及，加上人们在诗歌、小说、戏曲中的不断渲染，西王母终于从一方之神成为道教和汉族神仙谱系中的最高女神，而西王母信仰也成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本篇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甘肃泾川西王母信仰民俗的文化结构和现代适应问题。作为一个在中国民间有着极大影响的民俗事象，西王母信仰至今仍然在民众生活中拥有自己的市场并发挥着功能。甘肃泾川是西王母文化的发祥地，当地的西王母信仰民俗文化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能发展到今日，说明它是一个活态

的运动的文化,具有自觉的更新性,因此,才能够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来发展自身,延续千年而没有消失。奥格本在《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一书中指出:“现代许多变迁都起源于物质文化,物质文化变迁又引起文化其他部分的变迁。人们认为,由于某些独特的力量和原因,非物质文化比物质文化变迁扩散得慢。因此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物质文化变迁在先,所引起的其他变迁在后。有时,这种滞后引起的失调时间很长,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①不仅西方社会在由近代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过这类社会问题,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也同样要面临这一问题。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下去,必将使社会整合度和凝聚力下降,不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现代社会的形成和运转。

在田野考察过程中,我发现当地的西王母信仰中存在着许多具体的民俗事象,纷繁复杂,丰富多彩,这些民俗事象具有不同的形式、内容和性质,却都集中体现在西王母信仰这一文化体系中。由此,我便想到从“文化结构”这一方面入手,来研究当地的西王母信仰。而这一文化结构并不是稳定不变的,也并不是一直处于和谐状态的。社会背景的变革能够对其产生巨大影响,不但能使这一文化结构内部的各个层面之间产生摩擦和不稳定性,而且也使这一文化结构本身与社会的关系产生冲突与矛盾。但西王母信仰并没有因为内外的矛盾和冲突而消失,反而能够延续千年,说明其文化结构必然发生了某些变革,以适应社会的发展。由此,在探讨涪江西王母信仰文化结构的过程中,就不得不同时研究它的现代适应问题了。

2. 学术史回顾

对西王母的研究,从20世纪初开始,就一直是学者十分关注的课题之一。究其原因:一是20世纪初神话学从西方传入我国,带动

^① W. F. 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4页。

了我国学着对中国古典神话的研究,西王母作为昆仑神话系统的代表,更是研究的焦点。二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神话太过贫乏,便提出利用古史传说将中国神话还原为完整的神话体系的构想。茅盾先生在其研究神话的代表作《中国神话研究 ABC》一书中就曾提出过这个问题,此后,有不少学者也致力于还原古史传说为神话,从史料中清理出原型神话的工作。因此,西王母与周穆王、汉武帝的相会等一些古史传说,也成为神话学界研究的重点。三是从汉代开始,西王母进入道家的神仙信仰系统,逐渐成为道教中地位最高的女神,对西王母的崇拜和信仰分布于极为广泛的地域,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西王母也有着重要地位。

基于以上原因,20 世纪以来,关于西王母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此起彼伏。纵观 20 世纪对西王母的研究,可以看出,研究途径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从神话学的角度对西王母进行研究。袁珂先生在其《山海经校注》及《中国神话史》、《中国古代神话》等著作中曾提及西王母;赵宗福《西王母的神格功能》和《论“虎齿豹尾”的西王母》也是从神话学角度对西王母进行了研究。此外,还有贾雯鹤《西王母神话考论》,冯文俊《干母女神神话与西王母神话相似性研究》,王知三《西王母民俗文化(神话)研究窥探》,何元智《西王母及其神话与信仰的功能》,姚义《西王母神话传说的演变和深远影响》,王祥玉《西王母神话故事的演变》,陈利民《西王母形象的演变》,李文实《西王母通考》等文章,都是从神话学的角度对西王母形象和演变所做的研究。

二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普珍《伏羲、西王母同属“西膜”》一文探讨了伏羲、西王母与彝族“西摩”、图腾“母虎”、昆仑“葫芦”和女祭“皋谋”的关系,说明了她们在神话中相互交融,趋于一致,进而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原始母系祖先的论点。此外,路笛《西王母国史论》,谢佐《昆仑神话的产生及其流变》,张怀宁《浅谈黄帝与西王母的交往》,刘伯夫《西王母文化的历史演变》,张伟《西王母会见周穆王地点研究》,董绍宣《昆仑神话西王母在青海的演变》、

· 4 · 仪式:崇拜与有序的神圣

《穆王西王母相会处——青海湖》,林河《对中国西王母民俗文化的重新认识》,陈佐邦《“西王母国”实考》、《西王母“虎齿豹尾”考辨》、《西王母石室与二郎洞》,范三畏《西王母的族源与东王公》,刘美崧《西王母与周穆王》、《西王母与周穆王续谈》等文,都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西王母进行的研究。

三是从宗教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王家佑《西王母与西膜》论述了西王母成为道教女神的文化渊源,刘映祺在《西王母与泾川回山》一文中介绍了泾川回山的王母宫,论述了当地的西王母文化遗存与道教的关系。

四是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李淦《从“永元模式”到“永和模式”——陕北汉代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图像分期研究》一文按时期排列出西王母画像的七种样式,并将其归纳为“永元模式”和“永和模式”这两种占主导地位的模式;梁白泉的《释“胜”》一文以充分的资料对西王母“蓬发戴胜”的原始形象中的“胜”的含义进行考察。

五是包括以上几个研究角度的综合性研究。张振犁的《西王母神话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一文从西王母形象的文献记载及其在中原的变异,探讨了王母神话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叶春生的《西王母神话在广东》,记述了广东地区流传的西王母神话。还有刘映祺的《论西王母》,从西王母哲学概念的形成、历史存在的真迹、原始形象的释通、祖庙遗存的考证等方面对西王母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可以看到,从以上五个方面对西王母文化所进行的研究的确是硕果累累,但是,结合田野考察对中国当代农村的西王母信仰进行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目前只有彭金山先生在其著作《陇东民俗》中对甘肃泾川的西王母庙会及泾川风俗进行了翔实的记载。此外,赵宗福在其博士论文《西王母信仰的生成及早期演化研究》中也对西王母信仰民俗进行了考察,但由于涉及的地域太广,所以对西王母信仰的民俗事象的记录并不够充分,谢麦年和张伟的《泾川西王母民俗调查》一文也只是对西王母庙会的粗略记载。因此,本论文试图从民间现存的丰富多彩而又活生生的西王母信仰民俗文化出发,探

寻它在农业村落中特有的文化结构,以及它在现代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中的自我调适是如何完成的。

二、西王母概述

西王母是一位从远古时候流传下来的神话人物,作为一尊大神,她在古代神话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汉代以后,西王母的形象逐渐与道教思想体系结合,又被称为“王母娘娘”,成为道教神仙系统中地位至尊的女神,在民间也是家喻户晓。有关她的传说故事就更加丰富了,其形象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最初古籍记载中半兽半人的样子转变为雍容华贵的女神形象。本章对史料记载中的西王母形象及其演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讨论了学术界关于西王母历史真实性的研究观点,并且分析了西王母神格中十分鲜明的生死二元性的成因。

1. 神话中的西王母原型

关于西王母的记载,最早见于《山海经》。《山海经》是记录我国古代神话的一部最重要的典籍,袁珂先生将其称为“神话之渊府”^①,可以说是非常恰如其分的。其中《山经》部分被认为著录于西周末至东周初,神话成分非常浓厚,是中国最早的神话记录。而西王母最早见于此书,可以说她最初是一位神话人物。

在《山海经》所记载的众多神话中,影响最大、也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就是西王母神话了。有关这一点,鲁迅先生曾经在其《中国小说史略》的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中指出:“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②袁珂先生在其《中国神话史》中也说:“《山海经》所记叙的众多神人当中,西王母是对后

① 袁珂:《山海经校注·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9页。